



松林书院是青州一中的发祥地，青州府的文脉之源。北宋时称矮松园，为著名的三元宰相王曾少年读书处。明成化五年（1469年）始称松林书院，明万历八年（1580年）阁臣张居正下令毁天下书院，松林书院未能幸免，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得以重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着晚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诏书的下达，书院教育走入历史，现代教育正式开始。

### 清代书院政策的转变

明朝末年，全国的书院在多次禁毁政策下已伤痕累累，加之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又使书院难免有池鱼之殃。清初统治者有鉴于明末士大夫借书院讲学抨击时政、削弱统治的历史教训，对书院的政策并不友好，担心士子聚集、自由讲学，书院会成为反清的大本营，为此一度采取压制政策，限制其发展。顺治帝曾谕令“帝王敷治，教化为先”，“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各级官学迅速恢复，中央设国子监，分六堂教习，地方除了府、州、县学之外，还设有社学、义学等。清初的青州府重视官学发展，官学兴，而书院的发展尚处于被压制中。

至康熙年间，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康熙帝认识到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对于管理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对书院政策转向积极地疏导、慎重地支持，于是书院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二十六年（1687），湖南岳麓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分别得到康熙皇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得以迅速修复并重新办学，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于是各地官府及民众开始争相兴复、创建书院。据白新良著《明清书院研究》统计，康熙时期，全国新建书院537所，而修复、重建前代书院达248所，其中就有青州的松林书院。

### 青州府官学的废弛

由于明末战乱纷起，民不聊生，青州府学几乎处于废弛状态。各地县学情形更为糟糕，早在明万历年间，青州府日照县县学就已“缮治不常，日就堕坏，庠廨破露，笱造图书，栖列无所，往往散乱不可省”，老师也不再传授授业，文教礼乐更加冷落萧索。

官学的废弛往往伴随着吏治的腐败。据文人安致远《青社遗闻》载，崇祯壬午（1642年），山东提学钱启忠品行不端，试后出谒宾客，见市中有卖海蟹者，在轿上手劈双螯吃之。士子出场时，自己把持门扉夺取考生伞，笔诸物，携抱累累，交于左右送入内署，观者喧笑，恬不知耻，最终因贪婪被黜。明末官场上的贪腐更是屡见不鲜，大明王朝日落西山已无可避免。

清初至顺治年间数十年，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官学大兴。至康熙朝，官学式微。光緒《益都县图志》载：“康熙七年（1668年）地震，（府学）大半倾圮，惟有大成殿独存。”康熙十一年（1672年）修葺，不久复圯，至三十八年（1699年）春，张连登任青州知府，“谒庙下，周旋四壁”，“所谓庙者仅颓垣数尺而已，圣像覆以破盖，贤者蔽以为席，为之愕然惊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青州知府陶锦在《重修青州府儒学碑记》中云：“今之设学，非古之设学矣。古之设学也，讲道；今之设学也，课艺。古之课艺也，兼乎六艺之全，专乎书文之一。而且师旷其官，士旷其

### 史海钩沉

整个中华大家庭有56个民族，百家姓记载了中国几百个姓氏。中华民族孕育发展的历史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字记载，将文字记载解构开来，是我们世世代代流淌在血液里的乡土情怀。

由于我们是历史的构成，于是，我决定沿着嫡脉这根线寻根溯源，弄清自己的祖先和族群的发展脉络，在寻根过程中不断找寻自己。

翻阅史籍，高氏最早出现在上古黄帝时期，中国最早系统记载姓氏来源的典籍《世本》载：“黄帝臣高元作官室。”春秋时期，齐太公吕尚(姜子牙)的八世孙齐文公吕赤有个后代即以先人封邑为高姓。

高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在《百家姓》(含复姓共472字)录入的450多个姓氏中排第153位，在中国姓氏人数排行榜上名列第十九位。高氏主流发源于今河南省境内，但在春秋以后，却以齐鲁之地分布居多。

#### 来自九华山下 落户临朐北关

有高氏记载的几千年，我们这支与祖先繁衍脉络的文字衔接断层于元末。我的寻根问祖也只能追溯到元末这断代（1320年）至今七百余年的历史。

元末，我的先祖高偕哲（临朐高氏的始祖，一世）从家乡安徽省池州府青阳县十里庙子村来，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一路打仗一路北行。明洪武元年（1368年），他所在的部队到达山东。在青州府战役中，先祖不幸负伤，滞留地方养病。明洪武二年（1369年），被安置在临朐县城北关。

高偕哲在当地娶妻生子繁衍香火，族人逐渐扩大。经过了二世高士文（庠生），三世高志（泚水典史），四世高颢（庠生），五世高宣后，北关形成了一条很像样子的高家胡同，从此，临朐县城地图便多了一条高家巷。高偕哲也因此成为临朐高氏的始祖。

原本得知先祖高偕哲的老家是十里庙子村，可以沿此线索继续上溯。但是后来寻根续撰族志的有关人士了解到，很久以前，

# 清代松林书院的重建与变迁

◎王岩



松林书院中院 沈志海 摄

业，黄官茂草，经年无复弟子之迹，遂使广文博士等于赘疣，而讲堂经阁几为虚置。恶在其为学校也者？”从记载看，康熙年间，青州府学连基本的课艺即八股文的教学都很少，遑论对生徒德行的培养。而且，学宫中老师“旷其官”，学生“旷其业”均为常态，学宫中荒草离离，多年不招弟子，先生博士成了“赘疣”，讲堂经阁虚设，哪里像个学校的样子？

官学和书院的关系往往此消彼长。康熙皇帝开明的书院政策使书院得到较快发展。松林书院得以重建并迅速崛起走向辉煌。

### 松林书院的重建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陕西华州人陈斌如以山东按察司金事出为青州兵备道，与青州知府金标主持，在废墟上重建松林书院，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月动工，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四月落成，易植大量柏树。当时书院的重建得到山东巡抚傅伦的大力支持，山东布政使卫既齐也“跃然出俸羨倡之”，陈斌如“倾貲佐之”，青州知府诸僚属绅士各闻风而动，纷纷捐餐钱以助成此事。陈斌如亲自作《重建松林书院碑记》，明确了重建书院的目的：“今重建而仍名以书院，原欲与诸僚属缝掖讲明此义，俾忠孝廉节日不泯于天地，若会文课艺，其余事耳。”体现书院教学初衷重在对生徒德行的培养，八股文的研究学习是次要的事情，至于沦为考课式书院更是在清末了。此碑现藏松林书院内，成为研究书院历史重要的碑刻之一。

陈斌如曾请当时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进士赵执信为之代写《重建青州松林书院碑记》，然写好陈斌如“嫌其词旨淡漠”，而“不之刻也”，即未被采用，此文见《怡山文集》。赵执信代写的《碑记》中提到“居人穆氏者求得其故地，余遂力任其事，而郡邑之守令与其乡之士大夫咸戚友而有成也”，又云“是役也，不藉公家，不扰里社”；明末清初文人李焕章在《松林书院志序》中也提到“穆氏等赏而复之”，可知松林书院故地由当地居民穆氏购得，在陈斌如和青州知府等官员的协力支持下建成，说明重建的松林书院性质为民办公助，在办学方面如聘任山长院师，生徒招生具有较大

自由。

#### 松林书院的变迁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青州知府张连登主持增修书院，一度改为社学，后改称张公书院。对于此事，赵执信在碑刻中讽刺：“修复之者遂欲自列于诸贤之间，是殆不自知者也。不自知者，人亦不知之。”松林书院东原有十三贤祠，祭祀寇准、王曾、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政绩突出的宋代青州十三贤，赵执信认为张连登欲跻身“十三贤”之列，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此时书院已逐渐官学化，经费由官府拨给，生童录取及平日考核之权操在地方官手中，院舍维修由知府、知县主持。

康熙戊子（1708年）至己丑（1709年）年间，黄崑圉任山东学政时，兴复济南白雪、青州松林两处书院，延名师，选才俊。山左文教，一时称盛。松林书院是青州府书院，但此时能跟省级书院——济南白雪书院一起，大受山东学政的青睐，当为“以府级之实厕身于省级之列”的书院，地位非同一般。黄崑圉居青州期间，考核生员，评定等级，一丝不苟。对优秀者，他聚宴教诲之；对较差者，决不轻易降黜。知府、知县如因小故请求剥夺生员资格，一概不准。此时考中的举人进士，包括江苏巡抚徐士林、湖南粮储道董思恭等十多名。赵执信认为，黄崑圉明辨是非善恶，学问功力造诣深厚，特别对其“慨然不滓之节，挺然不挠之气”予以高度评价。黄崑圉任期将满，还朝之日，青州士子“皇皇如失所恃”，于是纷纷跑到山东巡抚都御史那里请求督学留任。在奏请未果的情况下，“则相与树丰碑于青州之松林书院”，将学政先生的大名跻身于名垂千古的“青州十三贤”之间，以表达一方学子对他的感激与爱戴之情，其事迹见藏于松林书院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赵执信所撰《黄崑圃政绩碑》和藏于青州博物馆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黄崑圉之子，时任山东学政黄登贤所撰《松林书院记》碑。

乾隆十四年（1749年），山东按察使沈廷芳巡视青州时拜谒十三贤祠，见“祠仅存而讲堂久圯”，念及皇帝明诏，于是与青州知府筹划，由益都县令具体负责，对松林书院进行修葺，又召集高才生并考查之，率僚属及生徒祭拜先贤，与官员及山长探讨了书

## 寻根嫡脉

◎高宏宇

之，报其事于朝，皇帝旌以‘德化’二字立牌坊于邑之北门外，于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时人咸崇之，谓德化世家，所以为德化坊高氏也。”此皇帝钦赐尚綱是谓提倡和弘扬以德治世的理念而为。

皇恩浩荡，县署即在县城北关立“德化坊”木牌坊一座，继又借力发力，把德化牌坊所在行政区直接命名为德化坊。

德化坊，在当时直属县衙。（嘉靖临朐县志）载：“德化坊，自儒林坊至北门外社稷坛巷。”据临朐文史专家王新生考证，德化坊位于当时的临朐县城羊肠街北段，即现在的民主路百货公司以北。辖区为旧县城北半部，即南到今新华路，北至三元街，东至旧县城东墙，西到文化路的这一片街区。

“德化”二字由皇帝表彰高氏尚綱而为牌坊名称，再为行政区划名称，于史罕见，成为临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为高氏世代引以为豪。高氏族谱记载，清代，高尚綱被列为临朐有史以来42名乡贤之一，入乡贤祠。

这里，有一件必须提及的事：有人借高尚綱被皇帝恩赐而无端地编造出其与明朝状元马愉的高氏交集故事，可谓弥天大谎。作为临朐高氏九世的尚綱，生于1502年左右。而马愉生于1395年，卒于1447年（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任上，马愉是朱祁镇的老师）。也就是说，马愉和高尚綱出生时间相差百岁之多。马愉在明朝第六位皇帝任上已经去世，怎能成为第十一位皇帝钦赐荣誉的高尚綱唱赞歌呢？

#### 受命长沟建村 困苦彷徨十代

书归正传。明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顶着祖宗的光环，多少有点功名的十二世祖高文铎响应朝廷号召，毅然放弃在朱封村优渥的生活环境，将大儿志学（十三世）

院的发展。其事迹载于沈廷芳《重葺松林书院记》。乾隆十八年（1753年），青州知府裴宗锡延聘原安丘知县，进士严锡绥任松林书院院长，“一时肄业诸生常数十百人，数年之间，登贤、书贡、成均者十余人”，其中包括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李文藻。裴宗锡重视道德教化，教育生徒“必先德行，而后文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裴宗锡调任济南，青人攀辕遮留，于北郭立“清正仁明”碑，书院诸生复于松林书院为立“去思碑”。

乾隆时期书院有松柏数百株。李文藻《四松记》中曰“植检柏多至四百余株”。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举人朱沅在《读书矮松园》一诗中也写道“城南四百八十松，我来坐卧居其中”。另据清代进士冯浩《安肃县知县沈君可培传略》载，“宋王沂公矮松园，故址松柏八百餘株，长夏阴翳，居甚适”。柏树具体株数虽有差别，但可想见当年书院松柏规模之大，气势之盛，“书院松涛”作为青州府八大景之一名副其实。现仅存18棵，成为书院沧桑历史的见证。

清乾隆末年，建于青州卫街之“云门书院”改为“青州试院”后，云门书院并入松林书院内，松林书院大门门匾改为“云门书院”。咸丰《青州府志》叙述“松林书院”沿革时曰：“今扁其门曰云门书院非明云门书院地也。”但从这一时期的书院课卷的印章看，习惯上仍保留了松林书院名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知府汪彦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知府李廷扬相继修葺松林书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政府颁布谕旨：“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艺学为辅。”清政府的本意是幻想以此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但也就是在这道上谕的推动下，各省书院在数年以来改革的基础上，终于走完了向新式学堂转化的艰辛历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松林书院改办为青州府官立中学堂，同东昌府启文书院改办的东昌府官立中学堂一起，成为山东省最早的国办中学，松林书院的最后任山长法伟堂被任命为中学堂的第一任监督，由此开启了青州一中现代教育的序幕。

#### 文物会说话

## 素彩见华章

——清康熙素三彩折枝瓜果暗龙纹盘

◎崔斌



潍坊市博物馆的清康熙素三彩折枝瓜果暗龙纹盘。（资料图片）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素三彩暗花云龙花果纹盘，盘口微外撇，弧腹，圈足，内外白地素三彩装饰，原属清官御用瓷器，所属年代清康熙。文物盘内外暗刻云龙纹。盘内在刻划纹饰上彩绘石榴等折枝花果纹，外壁在刻划纹饰上彩绘折枝牡丹花纹两组。花卉施以绿、紫、黄等低温彩釉。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款，外围青花双线圈。此盘以黑彩勾绘纹饰轮廓线，将果实的饱满、丰硕表现得淋漓尽致。纹饰层次分明，色彩素雅。

而在潍坊市博物馆内，也有一件素三彩藏品，为清康熙素三彩折枝瓜果暗龙纹盘，圆唇，撇口，腹壁斜直，浅圈足。通体施白釉，白釉乳白莹润，素三彩主要为绿、黄、紫等色，呈色纯正。盘身内外均刻暗龙纹为地纹。其上以绿、水绿、娇黄、淡紫等色绘折枝佛手、桃、石榴，寓意多福、多寿、多子。圈足底沿露胎一周，底部中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识。

两者相较，风格题材类似，但潍坊的这一件在盘内风物上更胜一筹。佛手、桃、石榴巧妙地对应了绿、娇黄、淡紫色，将素三彩的色彩和题材融合，色彩饱满，团花锦簇，枝叶相依，有格局，有气势，有留白，不动声色间将吉祥如意呈现出来了。

此器烧制方法是先在素胎上暗刻云龙纹饰，施透明釉后入窑高温烧成白釉暗花云龙纹瓷盘，然后在瓷器的表面用素色彩料绘花果等纹饰，再入窑经低温焙烧而成。二次烧成工艺，使得釉下刻花与釉上彩绘相结合，表现手法丰富、明暗、阴阳，主次相互依存。云龙纹打底作为衬托，也有帝王之气；“福寿子”三多的纹饰明丽呈现，让幸福吉利的的人生愿望低调诉说，彩绘纹饰下刻画的神色纹饰若隐若现，虽无张扬，豪气满满。

说起素三彩，往往让人想起珐琅彩、青花五彩、墨地三彩、蓝釉白花等彩瓷的样式。素三彩的“素”，其一指的是“素胎”，在素胎上刻画，填入釉料烧制；其二是指“素色”，古代有“红为荤色，非红为素色”之说。明清的一些瓷器以黄、绿、紫三色彩料为主，有时还加少许白彩和黑彩，因无红彩，色调冷艳，素雅，故称为素三彩。

最早的素三彩见于明代成化时期，1986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了数件用黄、绿、紫等彩料烧制的素三彩瓷。正德时期素三彩传彩品与成化、弘治时期一样，并不多见，但是与前、后时期相比，制作水平非常高。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素三彩海螭洗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嘉靖、万历时期素三彩的产量有所增加。

清代康熙年间，康熙帝兼容并蓄，文化方面恢宏博大，文人参与了画瓷，促进了瓷器品种的繁荣。而在皇宫造办处，有中国的士人、工匠和西洋的画匠共同研发，烧造御用瓷器。素三彩的发展史上，以康熙年间最为盛行，并有创新，它的彩色除了黄、绿、紫外，还增加了当时特有的蓝彩，同时，加彩的方法也更多样，有的在素烧过的白瓷胎上直接加彩，然后罩上一层透明白釉，用低温一次烧成。传世较为常见的素三彩花果盘即属此种制作方法。也有有的在白釉瓷器上涂以色地，再绘素彩，如黄地加绿、紫、白彩，黄地三彩，绿地加黄、紫等彩。墨地素三彩器则是更罕见的精品。

康熙年间的素三彩器，对于明代成化、正德之三彩和嘉靖、万历色地重叠工艺多有继承，但又发明素胎上刻划出纹饰轮廓线，绘以图画，涂以釉彩，其工艺标新立异，品种丰富多样，质朴雅洁，黄色地、紫色地、米色地、虎皮釉等反复交替使用，变化莫测而颇具匠心。

其中，白地素三彩瓷器的这件藏品就属白地素三彩。其特点为采用釉下刻划与釉上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在彩纹饰下还隐现着另一种刻花纹饰，表里相合。白地素三彩主要作品除了花果纹盘，还有山石牡丹纹盘、花蝶纹碗等。这些素三彩器，瓷面表面会有紫绿黄彩绘画的花果、山石、牡丹纹等，纹下隐现云龙火珠纹，纹饰层次分明，显示出刻划植物纹饰并存，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面。

陶瓷界还有另外一种“素三彩瓷”的定义，即素三彩瓷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是以黄、绿、紫三色为主的瓷器，其实并不限于此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料填在已刻划好的纹线内，再经低温烧成。

康熙年间是中国陶瓷史上素三彩制作最繁荣的时代。这不仅表现在器物数量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且在器物造型、装饰技法、图案纹样、色彩的变化上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

从素三彩瓷器上，可窥见乾隆盛世的国力之盛、物阜民丰。素三彩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年崇尚清雅、寄情吉祥的审美风尚，有一种低调奢华的人文之美。